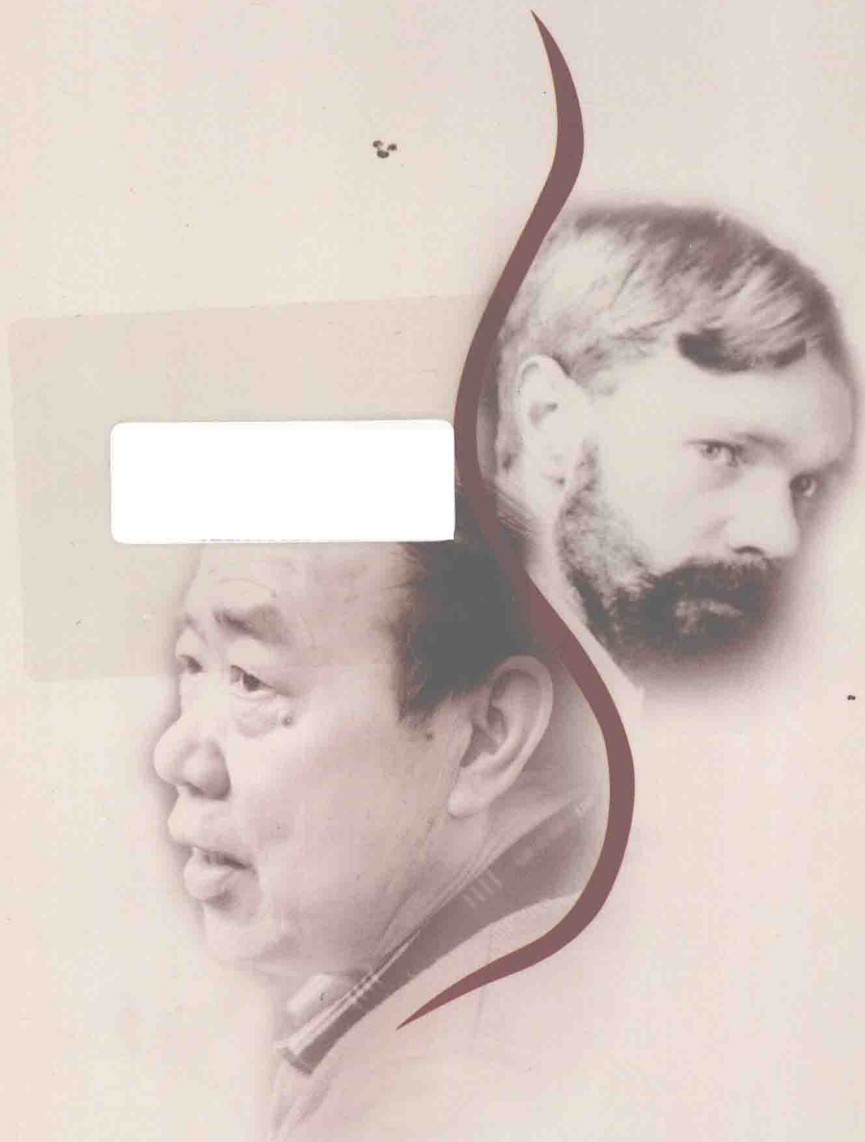


李碧芳·著

劳伦斯与贾平凹比较研究

—— 身体·性爱·空间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劳伦斯与贾平凹比较研究

—— 身体 · 性爱 · 空间

李碧芳 ·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劳伦斯与贾平凹比较研究:身体·性爱·空间/李碧芳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615-5105-9

I. ①劳… II. ①李… III. ①劳伦斯, D. H. (1885~1930)-文学研究
②贾平凹-文学研究 IV. ①I561.065②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5129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xmupress.com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20×970 1/16 印张:13.5 插页:2

字数:250 千字

定价: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营销中心调换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劳伦斯小说创作述略	1
第二节 贾平凹小说创作述略	6
第三节 劳伦斯与贾平凹比较研究意义	11
第一章 身体叙事	12
第一节 自然态的身体	14
第二节 病态身体	33
第三节 灵魂与肉身	48
小 结	58
第二章 性别叙事	60
第一节 男性人物形象解读	61
第二节 女性人物形象解读	92
第三章 性爱叙事	115
第一节 性爱与婚姻	116
第二节 性爱与性权利	135
第三节 性爱与政治	150
第四章 空间叙事	166
第一节 城市空间和乡村空间	168
第二节 现实空间和心理空间	186
小 结	206
参考文献	208

导 论

第一节 劳伦斯小说创作述略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文学评论家和画家。1885年9月11日他出生于英格兰诺丁汉郡伊斯特伍德一个煤矿工人家庭,年轻时曾任过教师,1907年在诺丁汉大学就读期间开始了小说创作的尝试。劳伦斯创作的小说包括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他的长篇小说创作依时间先后可划分为四个时期。1911—1913年为第一个时期,其间,他发表了长篇小说《白孔雀》(1911)、《逾矩者》(1912)及其成名作《儿子与情人》(1913)。1914—1919年为第二个时期,代表作有《虹》(1915)和《恋爱中的女人》(1920)。1920—1925为第三个时期,其间,劳伦斯创作了《阿伦的杖杆》(1920)、《迷途的少女》(1920)、《努恩先生》(未完,1984年出版)、《袋鼠》(1924)、《丛林中的男孩》(1924,与人合作)、《羽蛇》(1926)等6部长篇小说。第四个时期是1926—1930年,其间,他完成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以及《少女与吉普赛人》(1930)的创作。除长篇小说外,劳伦斯还写了约70篇中短篇小说、近1000首诗歌、数量可观的游记和书信作品,以及风格独特的文学、心理学、政治、历史、艺术著作和评论。劳伦斯是多产作家,但就其成就而言,以小说创作为最。

劳伦斯是20世纪英国最独特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大量运用象征、比喻和意象描写的手法,从探索两性关系变化的角度揭示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而产生的现代文明社会对人性的摧残和异化。理解劳伦斯的小说精髓,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其一,劳伦斯对英国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其二,劳伦斯作品表现的主题思想;其三,劳伦斯作品的现代主义元素。

在论及劳伦斯小说对文学传统的继承问题时,文学界和评论界有所争议。

以 T.S.艾略特(T.S.Eliot)为代表的一方否认劳伦斯作品中的传统内涵,因为艾略特认为,一个作家对传统的把握来源于其对历史的感受,而劳伦斯的生活“完全不受传统或社会制度的约束,……缺乏传统知识和社会知识的训练”,因此,“他不能进行我们传统意义的思考”。^①而以 F.R.利维斯(F.R.Leavis)为代表的一方则认为劳伦斯就生活在鲜活的传统氛围之中,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延续性出现断层已是既成事实之时,我们仍然认为劳伦斯代表了人类传统之精华”^②。事实上,无论其个人生活还是其作品的风格、形式或内容,传统对劳伦斯的影响都是十分显著的。就其个人而言,劳伦斯受其家庭生活背景的影响十分深刻。他出生于 19 世纪末期英国一个矿工家庭,他的出生地伊斯特伍德是工业革命将众多杂乱的居民区变成丑陋的现实的一个地区。原本是森林密布、良田一片的旧农业乡村,因为工业革命而变得满面沧桑,毫无生机。因为劳伦斯生活在新旧英国混乱的交替时代,他对工业革命给旧式田园般接近自然的生存状态所带来的冲击感觉敏锐。在其作品中,劳伦斯多次描写了伊甸园般美好的田园生活和冷酷无情的机械化现实的冲突。半自传体小说《儿子与情人》中作为矿工的父亲的猥琐,《恋爱中的女人》中只追求最大化的利润不惜牺牲矿工利益的煤矿主杰拉德的冷血,以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对机器大工业破坏自然界的声声控诉,无不反映了劳伦斯对传统英格兰的热爱和惋惜之情。另外,早期的劳伦斯,不仅见证了其出生地所处的两种文明之间的强烈对立,而且还身处其家庭中以他父母为代表的两种截然对立的生活方式和文明中,“像块煤渣似的”矿工父亲和具有小资情调的母亲之间始终存在的矛盾冲突和不平衡也一直困扰着劳伦斯,使其对阶级地位的差异异常敏感,同时也陷入了如何建立男女理想关系的循环往复的追寻之中。这种双重对立使劳伦斯敏感的思维深受折磨。正是他思想上不断经受的分裂与对峙,使得劳伦斯在面对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对立时,开始思考这些现象,并尝试去调和与对立,实现对立之间平衡与统一,由此产生了其“两极平衡”的哲学思想。就其作品而言,劳伦斯的创作风格、形式和创作思想都深受诸多前辈或同时代文学家、艺术家的影响。比如他的自然生态理念得益于华慈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他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意识和情爱观有奥斯汀

^① Jeffrey Meyers, *D. H. Lawrence and Tradition*,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85, p.1.

^② Jeffrey Meyers, *D. H. Lawrence and Tradition*,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85, p.2.

和勃朗特姐妹的影子,而他作品中对乡村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描述以及现实主义风格又受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和本涅特(Arnold Bennett, 1867—1931)的影响。英国诗人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 1844—1927)提倡性解放,不仅实践同性恋而且还将同性恋看作弥合个体与阶级差异的有效手段,他的思想在劳伦斯的作品中得到积极的响应。艺术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在《近代画家》(Modern Painters)中阐述的反工业革命,以文学艺术拯救现世人生的思想,以及他援引《圣经》文字的习惯和对情感、内在反应、心理与道德的认知以及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重大美给予的关注同样深刻地影响了劳伦斯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倾向。此外,深刻影响劳伦斯的还有英国作家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美国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1892)和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哈代注重自然环境的描写,并把自然环境纳入人物的悲剧之中,其笔下人与景物的描写富有神秘的色彩。哈代将世界看成一个“宗教”场所,到处是奇迹和神秘的事物,他感兴趣的不是人的外在行为,而是生命的实质内容。他致力寻求一种能深入挖掘和表现人性的方法,探索扑朔迷离的无意识领域。而这些也正是劳伦斯在其作品中致力实现的。惠特曼不拘于传统的创作形式,坚定不移地追求自己的艺术境界,富有冒险精神,以诚实自然的态度对待身体、性和死亡等主题,他赋予劳伦斯的是可贵的对艺术创作的诚实态度和自由的创作空间。而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和超人哲学,他对意志、本能和理性的推崇更促成了劳伦斯的生命哲学和血性哲学,劳伦斯也因此被称为“英国的尼采”。

作为小说艺术家的劳伦斯,在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中除了小说以外,还有小说理论。劳伦斯的小说观在其《小说为何重要》(Why the Novels Matters, 1936)一文中得到明确的阐释。他以为,“小说是唯一光彩夺目的生活之书”^①。劳伦斯所说的“生活”有两层意思。其一,要由人的身体去感知生活,而不仅仅是依赖理智或纯粹的精神。其二,生活意味着人的全方位发展。基于以上观点,他的小说创作就十分重视探索和揭示人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他善于将人放在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之中加以考察,从而真正揭示人与宇宙之间的相关性。劳伦斯的小说观体现在其作品的多层次主题之中,它们最终可归为两大类,即自然的主题和

^① D.H. Lawrence, Why the Novels Matters, Anthony Beal. ed. *Selected Literary Criticism*,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55. p.105.

性爱主题。劳伦斯认为生命的本真状态应是“人与自然的契合”。回归自然、返璞归真是他作品的永恒主题。在他的作品中他一再赞美在煤油滚滚、井架林立和机械轰鸣的城市旁边一隅尚存的大自然,未经工业文明污染的农庄、森林总是恬美安静而富有活力的。《虹》中的沼泽庄园,《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林地和小屋以及“自然人”麦勒斯身上蛰伏的生命活力对枯萎的康妮的拯救,《恋爱中的女人》中伯金与大自然的交流和融合使其忘却现实苦恼并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欣喜和成就感,这些均给人以与世隔绝的伊甸园般的感觉和印象。归结起来,劳伦斯的生态伦理观在其小说中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对人类为了经济发展达到对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而破坏自然环境的恶劣而极不负责任的行为的谴责,指出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在本意义上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二,人必须重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回归自然、融入自然和感悟自然。那么人类自我拯救的道路在哪里?劳伦斯通过他的作品告诉我们:回归自然、与自然界合为一体,是人类想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下去的唯一选择。

性爱主题是贯穿劳伦斯作品的另一大主题,而且也正是因为他在许多作品中大胆的性爱描写,他的书被禁出,他的人格被人误解,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自己对性爱的态度,因为在他看来性爱是神圣的,崇高而美丽的,它是真正的宗教。他这样理解性爱,“我确信,只有通过调整男女之间关系,使性变得自由和健康,英国才能从目前的萎靡不振中挣脱出来”^①。在他的主要作品如《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妇女》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劳伦斯把男女两性关系上升到宗教高度,让男人和女人们通过两性关系的完美结合,创造出一个新生的世界。劳伦斯的性爱主题主要表现在他的“星际平衡”的理念和血性意识之中。“星际平衡”亦称“两极平衡”。劳伦斯用两颗有相同方向而又保持一定距离的星星来比喻男女之间的关系既有协调一致(包括精神和肉体的同一)的一面,又有各自具有独立意志的一面,这是不可取代的两种势均力敌的力量,而且这两个方面是并存的,不能因为同一就取消了自己的独立意志,也不能因为要获取独立意志而放弃同一。而血性意识则表达了劳伦斯对肉体的信仰和对血的呼唤的响应。在他看来,女性和男性结合所产生的性爱行为是向未来世界的跃进,只有男人和女人组成的结合体才能生成“完美的意识”,从而性的和谐才能彻底地实现,也才能促进“血性意识”的升华。

^① 劳伦斯:《劳伦斯书信选》,刘宪之、乔长森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页。

劳伦斯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识和世界观,他对 20 世纪动荡不安的社会、岌岌可危的人类信仰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的作品致力于对个人本质的探讨、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以及对现代工业文明下人类灵魂扭曲后的矛盾与冲突的消解,这些努力使他跻身于现代主义作家行列。劳伦斯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其作品题材与表现形式的变革与创新上。作品题材方面,首先,劳伦斯把创作视线从外部的客观世界转向人的内部世界,注重揭示工业文明对人性的摧残,阐述人物的非英雄本质以及内心世界的混乱无序,着重表现西方人的悲观情绪和复杂心态。劳伦斯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激进的工业文明的批判者。他的小说始终都围绕着对工业文明的否定以及复归自然和本性这两个主题展开。他把社会批判与心理探索相结合,以揭示人物心理矛盾与精神障碍的方式来表现在现代机械文明里受到压抑及趋向分裂的自我。此外,劳伦斯在作品中创造了许多新女性的形象,比如《恋爱中的女人》中的厄秀拉和戈珍、《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康妮等,她们与 19 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女性形成强烈反差,摒弃了“家庭天使”的传统女性地位,积极参与公共社会活动,追求思想独立,追求个性解放,追求性爱自由与享受。虽然劳伦斯对这些强势新女性存在既迷恋又恐惧的矛盾态度,但这些新女性的创造无疑是他向传统宣战、迈向激进的现代主义的一面旗帜。其次,劳伦斯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原始主义倾向。原始主义是作家对现代社会中人们混乱病态的生存状态在文艺文化中的反映和拯救。劳伦斯借用自然主义、意象、象征、原型等创作手法创造人与自然的典型氛围。他竭力推崇原始主义,旨在反衬现代工业社会人性的堕落与人格的分裂,唤醒现代人的直觉、本能等原始意识,重构被工业文明破坏的原始人类自然和谐的生存方式。他的原始主义情结具体体现在他对两性关系的理解上。劳伦斯刻意忽视了社会行为规范对人的规训,强调肉身的重要。他信仰原始的激情,试图通过建立男女之间最原始最自然的性关系解放被文明异化的心灵,使人类回归本质的生命,获得终极解放,达到灵与肉的结合。再次,劳伦斯的作品始终蕴含着非理性主义元素。他的小说存在一股来自冥冥之中的神秘的令人不安的力量,它在生命的某个时刻苏醒,使人陷入非理性的发作之中。劳伦斯作品中的非理性元素与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尼采的“权力意志”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息息相关。受叔本华影响,他将性作为纯动物的自然冲动,在作品中从纯精神层面演绎两性间精神占有与反占有的斗争;受尼采影响,他崇尚生命,信仰肉体,视人的肉体 and 血性高于理智和道德,认为人体生命的新生是基于性爱的新生,是基于原始人性的新生;受弗洛伊德影响,他将性爱视为一种动物本能,把性爱与文明对立起来,重视人的无意识,将理性化、

社会化之人视为病态的“社会生物”，视理性为人类文明陷入危机之根源。作品的表现形式方面，虽然劳伦斯的作品仍然保留传统的叙事风格，比如全知全觉的故事叙述者、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直线型封闭型结构等，但更多的却是他对传统小说叙事结构的背叛。比如其作品中《圣经》神话原型叙事与其创作的故事之间形成的对位性结构，还有其作品不拘泥于传统的情节性结构，以心理空间搭建创作平台，形成“历时性”与“共时性”共存的多轨时空网络，使小说叙事空间极度膨胀；另外，其作品中象征和隐喻的叙事策略以及暗示、复调等手法的应用，也扩展和深化了文本的诗意内涵，使作品叙说中具体化的人、事、物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小说的媒介作用，对后世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贾平凹小说创作述略

贾平凹，1952年2月21日出生于陕西省丹凤县棣花乡，是中国当代文学大家和文学奇才，被誉为当代中国最具叛逆性、最富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他从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后从事专业创作，目前已出版的作品版本达300余种。著有长篇小说《商州》、《妊娠》、《逛山》、《油月亮》、《浮躁》、《废都》、《白夜》、《土门》、《病相报告》、《怀念狼》、《秦腔》、《高兴》、《古炉》等，中短篇小说集《山地笔记》、《小月前本》、《腊月·正月》、《天狗》、《黑氏》、《美穴地》、《饺子馆》、《艺术家韩起祥》、《兵娃》、《丑石》等，散文集《月迹》、《心迹》、《爱的踪迹》、《走山东》、《商州三录》、《说话》、《坐佛》等，诗集《空白》，以及《平凹文论集》等作品。他的作品不仅在国内屡获殊荣，如短篇小说《满月儿》1978年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腊月·正月》1984年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贾平凹长篇散文精选》2005年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秦腔》2008年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等，其作品还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越语、日语、韩语等多种语言在世界20多个国家传播并且赢得了世界声誉。国际上获得的大奖主要有：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浮躁》，1987）、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废都》，1997）、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荣誉奖（2003）等。

贾平凹的创作大致分为四个阶段^①，每个阶段的作品又体现了他不同的

^① 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参照下面文章：杨光祖：《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四个阶段及其文化心态论》，雷达主编《贾平凹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13页。

艺术风貌和异样的文化心态。第一阶段自1977年到1983年。这一阶段有学者称之为“假声写作”阶段。这一时期他出版了两三本作品集,其中以《山地笔记》成就最大。作为刚起步的文学青年,为了能顺利发表小说并得到社会的认可,贾平凹颇受约定俗成的审美习惯和社会价值观的束缚。他作品中的“阶级斗争”的写作模式、墙报宣传语言以及对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迎合等现象都说明了他初出茅庐的稚嫩和略显粗糙的艺术表现手法。第二阶段自1983年到1993年,这一阶段被称为“商州文学”阶段。这个时期贾平凹才思涌动,开始了真实的书写。他准确把握住了当时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生机,并且找到了自己新的创作定位,开始集中精力书写商州,完成了一系列带有“商州情结”的作品。这些作品文体得到突破性的创新,作品内涵丰富,具有超越时空的艺术震撼力,文笔也显得苦涩、老练。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浮躁》。评论家普遍认为这一时期是贾平凹创作的第一个变化期,是他创作的黄金时期。第三阶段是1993年的《废都》阶段。《废都》是他发表的第一部都市题材的长篇小说,标志着他创作的第二个重大变化,也是他创作的第二个黄金期。《废都》因性描述在发表以后受到种种非议,批评声此起彼伏,但经过岁月的历练,它的文学价值最终还是得到了普遍的认同。第四阶段于1993年后。如果说《废都》之前,贾平凹努力追求的是社会价值,他的作品力图体现作家的道义和社会责任感,他的创作仍属于社会化的创作的话,那么此后他的创作则偏向于生命体验的探索,个性化特征凸显,作品内容趋于社会化、世俗化、日常化、琐碎化、商业化。这一时期贾平凹的创作手法日渐成熟,创作心态更加平和,结构上更多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意象世界也更加玄妙魔幻。其间,发表了如《高老庄》、《怀念狼》和《病相报告》等一些优秀作品。

贾平凹的文学作品极富想象力,对时代、社会、人生普遍生存状况等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他的作品呈现了丑恶与病态、罪恶与血腥、残暴与无耻以及美好与善良、正义与民主、怜悯与宽容等人间百态。贾平凹作品的魅力主要体现在其独特的审美视角、旗帜鲜明的文化意识和哲学意识以及与主题相得益彰的叙事艺术等方面。

贾平凹作品中最突出的审美视角就是其地域文化视角。其作品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道德品格和意识情绪。他自觉不自觉地以家乡商州的人文地理、自然风光、历史现实为创作的背景,深入地表现着时代剧变中家乡的民情风俗、社会心理及个人命运的变迁,刻画着乡里人的性格与灵魂。其小说《商州》、《秦腔》、《古炉》以及散文集《商州三录》等无不弥漫着黄土的气息、秦腔的旋律、汉唐的雄风。这些作品全景式地写出了特定地域的风土

人情、社会习俗和自然景貌,从文化的深度揭示了人们的生存世相,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表现了本土人生命力的质朴、坚韧、绵长,贯注着他特有的文化意识和审美价值取向。当然,贾平凹作品中的生态审美视角也不容忽视。贾平凹的生态审美视角有以下两个关注点。第一,对生态家园的眷恋。他的许多作品都以细腻的笔触向读者展示美丽淳朴的乡村世界,这些作品充满了他对和谐安宁、自给自足的淳朴原始的乡村生活的礼赞,更充满了他对因现代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侵入而产生的当今中国乡土历史与文化裂变的伤感情怀。现代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侵入,使耕地大量流失,因此大量青壮年劳力从乡村出走,村庄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显得十分萧条冷清。面对如此现实,贾平凹试图用原始故乡意象消解现代文明对乡村文化的冲击,这使其作品承载着沉重的拯救乡村的冲动和历史使命感。第二,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想。贾平凹的作品采用寓言式的叙事手法展示人与动物或植物之间的通灵性。其作品常见鸡、狗、猪、狼、老树等意象,人与动物或植物之间的通达的思想交流场景栩栩如生,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灵与肉的交融之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得到极大的张扬,而破坏自然、随意杀戮牲畜的行为描述则体现了作者对人性的严肃思考。此外,贾平凹作品中的审丑视角也是一大亮点。审丑作为现代派的美学思想与中国新写实小说所倡导的“还原生活本相”、“不动情我关照”、“不回避粗俗、猥琐场景的描写”等文学主张相吻合。贾平凹在创作过程中逐渐接受了西方现代派和中国新小说文学思想的影响,在作品的美学取向上,以20世纪90年代作为分水岭,完成了从审美向审丑的转向。在他20世纪90年代以后创作的作品中,琐碎、凡俗、丑恶、怪诞、猥琐等题材比比皆是,表现的是现代文化语境下丑陋的乡村风俗和愚昧怪诞的乡人乡情。这些都是贾平凹精心选择的意象,它们意指现代人变态的物质欲及其萎靡虚无的精神境地和每况愈下的人类生存环境。但贾平凹审丑并不是为了单纯地露丑,他的审丑其实蕴含着他自身对人性的探索、对人类的大爱、对人类精神存在的深刻思考,以及其对现实公正和一切美好的不懈追求。

在文化意识方面,贾平凹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开创了新的传统。贾平凹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作家,他的作品渗透着中国文化的精髓。贾平凹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首先来源于他的故乡商州。商州位于陕南,是陕西、河南、湖北三省的交界之处,一脉秦岭,两条大江,使得商州不仅成为南北中国地理上的过渡与交叉区域,而且造就了商州文化的独特性——它沟通了中国古代两大文化体系——秦文化与楚文化,形成了两种文化的交叉。也正因为如此,商州佛和道特别盛行,巫文化也特别盛行。贾平凹从小就接受商州民间文

化的浸润与熏陶,看了许多奇人奇事,对风水、卜卦、驱鬼、祭神、出煞、通说、气功、攘治、求雨、观星、再生人等十分熟悉,这些元素反映到其作品中,作品自然产生了诡秘之气。其次,贾平凹的传统文化知识积累与其阅读兴趣和性情有关。贾平凹对中国古代文化兴趣浓厚,而他喜欢的文学大师有很多都与佛教有很深的渊源,比如柳宗元、苏轼、白居易等。他深受《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古典文学的影响,而这些作品都带有浓郁的佛教气息。另外,他阅读范围广泛,除文学外,还涉猎百家杂书,甚至麻衣相法、佛教大纲,尤其喜欢有“中国佛教”之称的禅宗。他还到访一些寺庙等佛教文化古迹。佛教文化的耳濡目染影响了他的的人生观。此外,贾平凹的孤僻内向的性格和通灵的感悟能力,以及他在事业、爱情和健康等方面屡经坎坷的经历,也是他接近佛教的重要因素。贾平凹人生观的主要特征是宁静虚远、淡泊超脱,与佛教精神十分吻合。随着阅历的不断增长,他的创作也不断指向宇宙与人生的深处。他富有佛教色彩的人生观自然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因此,在他的作品中,读者看到了再生人以及能卜会算的智者之类的人物也就不足为怪了,而生死流转、业报轮回、亦人亦兽等神奇现象的出现,也为他的作品蒙上了浓烈的神秘色彩。其作品的恬淡、从容、本色等,也都表现出他受到中国传统美学尤其是庄子和楚辞浪漫主义的影响。

贾平凹是富有创新精神的现代作家,他的世界观、创作观,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地更新、发展,而他的文学创新与其现代意识密切关联。首先,贾平凹擅长用现代意识观照中国的古老哲学,他的作品,表面上展现的是商州日常生活场景习俗、平凡琐碎的人际关系,而实际上他专注的是中国传统伦理哲学中的“仁学”结构,是对仁、礼、义、孝、善一系列范畴的现实意义的追寻。在题材选择上,虽然他侧重选取富有民族特色的生活细节,也刻意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汲取养分,但他更重视将中国情调和现代意识相结合。例如在《商州初录》中,他借描写特有的生存方式和风土人情,一方面展现来自民间的美好人情,另一方面描写农村社会中传统与现实的冲突,描写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生活方式对古老民风民俗的冲击,以及所引起的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由此来探索人性在时代变革中的内涵。其次,贾平凹还是当代不多的具有整体性精神关怀向度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关注现实,还关注存在的境遇、死亡和神秘的体验、自然和生态的状况、人性的细微变化等命题。他打破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单一叙事维度,把文学从单维度向多维度推进,从只是关涉国家、民族、社会和人伦等的简单“现世文学”中走了出来,以一种整体的眼光来重新打量这个世界,在天、地、人的宇宙架构中寻找生命的终极价值,从而使文学真正走向深

刻、超越和博大,并使其具有丰富的精神向度和意义空间。此外,贾平凹作品集中西文化于一体的现代意象叙事策略也成就了他与众不同的风格。散布在他作品中的意象十分丰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自然意象,以商山丹江以及山地产物为主,尤其是附带生成的山上月迹石趣等自然物象,比如三石、明月、奇花、飞碟、古柏等等;二是神秘意象或元素,包括:老怪异人和灵怪之物如太岁、麝、灵性狼、狗和与之相关的梦幻幻象之类;其三是文化意象,它涵盖山地风俗、山地文化和社会景观,比如照影壁、瘥神庙、砖雕、寺院、铜镜等等。从《古堡》、《浮躁》一直到《古炉》,贾平凹的作品都蕴蓄着独特的意象叙事特征,这些意象是对当代中国文学叙事形态的大胆拓展,在后现代全球化语境下,彰显了中国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和思维习惯,同时,这些意象叙事的民族文化和文学色彩也赋予其作品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品性。贾平凹的创新还体现在其艺术风格和艺术语言上。贾平凹的作品以“静”、“雅”为主导特色,贯穿于其作品的月神、禅意、雅气和诗意使他的小说故事清幽动人,端庄典雅。

他的艺术语言特色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其一,对古典文体的承继和发扬。贾平凹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小说笔记形式来描写古老的土地上秦汉文化的精髓与底蕴,说话体、简朴的文字与明清的笔记体小说传承一脉,折射出中国古老文化的深沉底蕴。贾平凹还擅长古诗词今用,他选取诗中的意象进行再创作,进而在复现诗中意境的同时创造出新的意境,使言语就此获得了层次感和审美特征。其二,乡土文学语言的创新应用。小说中生动活泼、地道本色的方言土语,能传神达意,切合人物身份,凸现人物性格。贾平凹深谙商州的风俗习惯,叙述详之又详,采用铺陈列举的方法将大小事物一一细数,言语拥有超大的容量,表现了极强的生活化趣味。其三,显性话语和隐性话语共存。显性话语是指首先向接受者传达的言语意图,隐性话语是指附着于显性话语而曲折呈现的言语意图。贾平凹将两种话语并置以达到使文本在两种声音的交织中呈现出一种表述的分裂的目的,使其艺术语言格外富有张力和意趣。其四,集长、短之形容于一体,这种情况多见于摹写人物内外部言语活动、叙写人物见闻等。其短句以瘦小形式达到言简意赅又意丰的效果,其超长句式,有的虽过百字,但句内多停顿,于繁复中见简洁,于沉静中见活泼。此外,贾平凹还擅长使用拟声法,或模拟人声,或模拟物声,拟人声可直接展现人物的性格及其喜怒哀乐,有益于塑造人物形象,而拟物声可烘托气氛,营造人物活动的“小语境”,使视觉与听觉互通,从而构成立体的活画面。

第三节 劳伦斯与贾平凹比较研究意义

本书分四个章节,主要从身体叙事、性别叙事、性爱叙事和空间叙事四个方面比较研究劳伦斯和贾平凹的作品。

鉴于劳伦斯和贾平凹都是各自国家最具叛逆性、最富创造精神且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而且他们的作品所折射出的人生价值观、生态思想、伦理道德观、审美情趣等诸多方面存在着相通相似之处,将劳伦斯和贾平凹两位作家的作品拿来进行比较研究就有以下几点现实意义:其一,劳伦斯和贾平凹都是各自国家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虽然他们属于不同民族,所处时代也不同,然而他们的作品却具有许多共同的关注主题,即人性、两性关系、乡土文化、社会转型下的人生百态等,而且两位作家在作品中均呈现了很强的现代意识,他们的主题均可纳入世界文学范畴。他们都追求和谐自然的人与人的关系,憎恶对人性的践踏,呼唤自然人性的回归。他们都大胆地涉足性爱主题,将性爱话语与国家的社会变革发展等话语联系起来,从而赋予性爱更深层的文化内涵。而他们作品中反映出的乡土文化,则将各自文化的传统与现代意识联系起来。比较研究他们的作品不仅可以让人们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道德观和审美意识,而且还可以广泛地从历史、文化、伦理、心理和生理等方面探索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其二,劳伦斯和贾平凹均属叛逆型和创造型作家。除主题表现外,他们的叙事风格和文学语言的应用都反映了他们这一特点。他们的作品都蕴含着丰富的象征和意象,他们的许多作品应用寓言式的叙事手法深化各自民族社会文化的内涵,而他们的文学语言技巧均淡雅脱俗,不经意间深刻了人物的形象塑造和作品主题的表现。比较研究他们的作品有助于人们考察和认知中西方艺术表现手法的异同,感受中西方语言在情景创意中各自所体现的无穷魅力。

第一章 身体叙事

身体叙事就是让写作指向身体,使身体脱离其物质性,而成为叙述性的身体。美国学者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在其论著《身体活》(“Body Work”)一书中讨论了叙述与身体的关系,认为“在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中,身体总是幻想的对象,它同时是指意活动——作为心灵和意志对于世界所发挥的作用,这种活动采取一个外在于物质的立场——独特的他者,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指意活动的媒介”^①,而“给身体打上记号,这意味着它进入了写作,成为文学性的身体,一般说来也就是叙述性的身体,因为记号的刻录有赖于一个故事,又推演出一个故事。给身体打上记号,这是关于进入了写作的身体成为文学叙述之主题的一个象征”^②。他还指出,由于身体是指意活动,是叙述中的关键记号,是叙述内涵的一个核心的连接点,因此它也是书写信息的地方,它体现了文本的意义。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身体长久地处于被压抑的地位,甚至被认为是邪恶与黑暗的化身。这种状况东西方均存在,只是遵循的轨迹不太相同。在西方,自古希腊开始,身体就在神圣与世俗的传统二分中被定位。柏拉图贬低身体,认为思考的境界完全是由灵魂来实践的,灵魂需要撇开身体,摆脱感受,这样才能通向纯粹的智慧、真理、知识。笛卡尔同样将意识与身体分离开,从他那里开始,身体被完全漠视了,在心灵对知识的孜孜探求中身体完全消失了。在身体被长期压抑与漠视的过程中,尼采出现了,尼采以肉体来指称身体,发出“一切从身体开始”的宣言,宣称所有的观念哪怕是思想这样抽象的观念都源于生物的机能,相应知识亦出于肉体本能的要求,由此,他彻底地将身体的动物性本能激发出来,从而解构了长期统治人们思想的身心二元对立说。

① 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朱生坚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② 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朱生坚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尼采的追随者福柯在尼采学说的基础上将身体纳入更深刻的哲学领域,指出身体是来源的处所,事件的起源根源于身体,历史的变迁可以在身体上找到痕迹。此后,梅洛·庞蒂提出“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问题开始”。在他那里,身体不是单纯的物质器官,也不是快感,“身体是意义的发生场”。就用身体取消意识主体而言,梅洛·庞蒂与尼采是一致的,但他们所行走的道路却不同,尼采及福柯根本就不想调和身体与意识间的关系,而梅洛·庞蒂则将身体插入了知识的起源中。梅洛·庞蒂通过身体表征突破传统的二元叙事,从而达到了身心的源初同一。与西方的身体从被压抑到取得正面地位所经历的历程相比较,在中国,身体解放的道路则更显漫长。身体在西方取得正面地位的时候,中国的身体仍然处于被打压的地位。几千年来我们对于身体的价值与意义都存在严重的认识偏向。中国传统文化推崇“仁、义、礼、智、信”,孟子的“舍生取义”宣告着对人的身体的否定与贬低。为了成为道德的典范与楷模,人们往往必须牺牲他们的身体。在宋明时期,随着此前佛学的盛行,出现心识的觉醒和身体的归隐,导致作为一种意识哲学的程朱理学的兴盛与阳明心学的大行其道。明清之后,由于西方意识哲学的传入,中国哲学研究的重心也渐渐偏向于“意识”而非身体。虽然在中国哲学的历史上,身体哲学也经历过几个黄金时代,比如先秦时期,有《尚书》“慎厥身”的重身主义,《周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身体宇宙论,《礼记》的“敬身为大”,《大学》的“修身齐家”等,还有明清时期,泰州学派“明哲保身”的推出,以及王夫之“即身而道在”的闪亮出场等,都使身体在中国哲学舞台上取得了重要的地位,但中国哲学的身体观问题重新进入学者研究的视域则是在近代,是在反省现代性的危机、西风东渐、知识分子对中国哲学的自觉反省等合力影响下产生的。随着生活的改变、个人空间的建立,以及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中国人也开始意识到自己有一个可以自由支配的身体。人们摆脱了过去那个沉重的、道德的身体,身体成为个人在世的证明,曾经被人们竭力压抑、厌弃的身体重新获得了生命与活力,身体成了一个人是否为自己活着的重要依据,成为自我的栖居之地。一个人自由与否,不仅取决于他是否能不受限制地思想,还要看他是否能按自己的意愿随意地支配自己的身体。这种身体伦理的变迁,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20世纪晚期的文学中,身体开始以反叛者的姿态冲破传统文化的枷锁。本能、性和欲望、无意识等纷纷作为身体之下的种种分支主体得到了极大的关注。身体范畴以及快感、力比多、欲望、无意等等,实际上就是对理性主义的反叛。

在文学作品中,当身体作为故事的发生场所,成为某种指意活动的媒介